

我的履历书



孙平彪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年4月11日，日本国立东京工业大学授予作者名誉毕业证书。



学生时代



1971年秋，从干校回京探亲，全家在颐和园合影。

1994年，
与夫人关毅。





1959年10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会见并宴请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中间着中山装者为作者，周总理身后为翻译刘德有。



1955年11月，周恩来、陈毅、廖承志接见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右二）。作者当时负责接待。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日「贸易签字仪式。后排右一为作者。



土震、作者与日本著名电影演员中野良子。

1983年访问日本，在东京目白田中角荣（左）私邸。





1972年7月，率
上海舞剧团访问日
本，受到日本各界热
烈欢迎。

1977年7月
13日，陪同来
访的日本资深政
治家二阶堂进（右一）在
北京天坛公园
观赏中日建交
时日方赠送的
樱花。



1985年3月访问
日本，在日中经济
协会冈崎嘉平太
（左）办公室。

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原副部长 刘德有

在一场大雪之后，北京是一片银白世界。我出席了里千家例行的新年茶会。茶室里，那么多熟悉的面孔，却不见每年必出席的孙平化同志，不免令人惆怅。身着和服、主持茶会的小姐说，今天我们点茶，用的是孙先生生前亲自刻制的“茶勺”，来缅怀他。她还告诉我们，这把“茶勺”取名“茶缘”，表明中日两国人民“以茶会友”，结成千年不解之缘。

我眼前浮现出 1997 年 8 月那一天的情景：在布满松柏和鲜花的灵堂里，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孙平化同志，安详地躺着。……他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走得那样急促，那样匆忙。然而，他给我们留下了这部回忆录——《我的履历书》。

如今，翻开此书，仿佛他仍活在我们中间，好像使我们又接触到他的音容笑貌，似乎听到他在向我们娓娓地叙说他那不寻常的经历。

想来，我第一次见到孙平化同志，已经是距今 40 多年

前的事了。记得，那是1954年7月，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的日本超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经莫斯科飞来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中有当时被称为“少壮派”而后来担任了首相的中曾根康弘，还有后来担任了外相，同中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园田直以及担任过众议院议长的樱内义雄。当时在《人民中国》杂志编辑部工作的我，被借调去做接待和翻译工作。在接待班子里直接领导我们的，就是孙平化和肖向前同志。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孙平化同志也不过三十七八岁，应该说彼此都很年轻。但是，我感到他和肖向前同志都已经是久经锻炼、熟悉业务的外事工作者。而对于我来说，却是第一次参加接待日本代表团的工作，一切都需要从头学起。我从孙平化同志和其他老前辈身上初步学到了一些如何做接待工作以及如何提高做外事工作的素质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为我后来从事外事工作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来说，孙平化同志对于我不仅是一般意义的老前辈，而且是我从事对日工作的启蒙老师。

人们知道，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历届政府所采取的对华政策，使战后中日关系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从1952年到1962年的民间往来，从1962年到1972年的半官半民，直到1972年9月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官民并举。孙平化同志除了“文革”中一段非正常时期外，可以说他从一开头就参与了各个不同阶段的对日工作，而且在周恩来总理和廖承志同志的直接领导下，

做了大量工作，并作出了有目共睹的重要贡献。

我在同孙平化同志的接触中，常常听到他谈论他和肖向前同志 1952 年春在北京接待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访日的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高良富和宫腰喜助的情况。当时，中日两国之间在法律上尚未结束战争状态，广大日本人民强烈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要求早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但是日本的执政者在美国的压力下，对新生的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禁止日本公民到“共产圈国家”访问，但这三位日本人士却拿着去法国的签证，取道巴黎到莫斯科，参加了国际经济会议。然后，毅然决定应中国代表团的邀请，冒险绕道访华，并在中国通过谈判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如果说，这三位日本朋友是开拓中日友好处女地的先行者，那么孙平化同志等人就是新中国开展对日民间交流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从那以后，直到逝世为止，孙平化同志几乎参与了中日关系发展的全过程。这在中国做具体的对日工作的人当中，也是凤毛麟角。

我作为一个后辈，能有机会在孙平化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做一点事情，感到很幸运。有许多事，在我的对日工作生涯中，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

1955 年 3、4 月间，以雷任民为首的中国贸易代表团为签订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访日时，我是代表团的译员，孙平化同志是副秘书长。当时，代表团的翻译人员在北京集中起来，学习贸易用语和对日政策。孙平化同志关心我们的学习，经常到我们那个组来，讲形势，谈看法。记得，有一次他

专门给我们谈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谈中日关系时一般不提“建立邦交”,而更多地提“关系正常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日两国在法律上还处于战争状态,两国关系是不正常的。只有恢复了邦交、缔结了和约,结束了战争状态,两国关系才算最后实现了正常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推动,而每走一步,都是“关系正常化”的具体体现,直到最后两国实现恢复邦交。他的这一席谈话,对于我们认清形势和任务,起了重要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代表团去日本,必须取道香港。我们到达广州后,孙平化同志率领先遣人员赴香港,经过一番斗争和曲折,终于办下了前往日本的手续,然后,先期抵达东京,迎接全团人员的到来。我能成为这批先遣人员当中的一个,是孙平化同志提议的。

孙平化同志在周总理和廖承志同志领导下,为使中日关系进入半官半民阶段,做了大量工作。说到这里,必须提及松村谦三先生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于1959年、1962年和1964年的三次访华。孙平化同志每次都是接待班子的负责人之一,我有幸参加了这三次接待,而且在平化同志的安排下,荣幸地担任了周总理同松村先生会谈的翻译工作。

松村先生选择1959年10月访华,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当时中日关系密不可分。1952年6月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后,中日民间贸易逐步开展起来,呈现出发展势头。但是,1958年4月长崎发生的日本右翼分子污辱中国国旗的事件,彻底破坏了中日两国间已经出现的友好气氛。

不消说,这是当时的岸信介内阁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的必然结果。由于“长崎国旗事件”的发生,中日两国间好容易建立起来的交往渠道几乎全部中断,剩下的只有中国方面向日本中小企业提供“照顾物资”这条细小的渠道。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从1959年起,日本一些有远见的政界人士忧虑中日关系的现状,开始展开活动,以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位访华的有影响的日本政界人士,便是前首相石桥湛山。紧接着,松村谦三率团来华。从中日关系后来的发展来看,周总理邀请松村先生在那个时候访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北京,周总理同松村先生进行了四次会谈后,孙平化同志陪同松村先生一行到兰州、西安、三门峡、洛阳以及昆明、成都、重庆、武汉、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访问。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不能不使这位了解旧中国的松村先生思想上引起震动。松村先生在结束访华时,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既未发表公报,也未发表纪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访问没有取得成果,而是双方有意这样安排的。孙平化同志当时引用白居易的诗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认为是很恰当的。通过双方的努力,松村先生的这次访华,为后来中日关系一举从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过渡奠定了基础。

果然,1962年9月松村先生第二次访华,周总理同他进行了三次会谈。在中方继续坚持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以及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的前提下,双方就“进一步促进和发展贸易”以及“采取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

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达成了共识。同年10月，高碛达之助率领一个包括22家大厂商代表在内的共42人的大型代表团到北京，双方根据周总理和松村会谈确定的原则，进行具体商谈，并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从此诞生了以廖承志和高碛二人的名字字头命名的“LT贸易”。我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事事处处都可以看到孙平化同志的身影。

1964年4月，松村谦三先生率团第三次访华。当时孙平化同志告诉我，松村先生不愿意再绕道香港，他想直接从日本到北京来，因此要乘轮船“玄海丸”，从门司启航到秦皇岛。平化同志便同王晓云等人一起前往秦皇岛迎接。松村先生抵北京后，周总理同他进行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政治会谈，廖承志同他就互设LT贸易办事处和互换新闻记者问题交换意见，并圆满达成了协议。中日双方互设办事处和互换记者，标志着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这一年的8月，孙平化同志作为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到达东京常驻。我作为中国第一批驻日记者到日本不久，办事处人员和我们中国记者都搬进文京区小石川的川口公寓。直到1967年，孙平化同志回国休假为止，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来往更加密切了。在孙平化同志回国之前，国内“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记得在川口公寓居住时曾有过这样一件事：这所公寓是日本老一辈剧作家川口松太郎和著名演员三益爱子的长子川口浩经营的。川口

一家都从事演艺工作，也住在这所公寓里。有一次，川口夫妇备冷餐邀请孙平化同志等廖办人员和记者到家里做客。席间，主人为了表示友好，把保存多年的梅兰芳的唱片拿出来欣赏。川口夫妇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我们大家都感到有些尴尬。川口夫妇哪里晓得，中国刮起的“史无前例”的风暴，横扫四旧，颠倒黑白，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我知道，孙平化同志曾于1956年陪同梅兰芳剧团到日本访问演出过，本来他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谈的，但在那种情况下，平化同志和大家心情都异常复杂，谁也不好说什么。然而，川口一家人的诚挚和友好情意，却令我们十分感动。

1972年，对于中日关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那一年7月，长期坚持反华的佐藤内阁宣布下台，田中角荣先生出任日本首相。我不能忘记：1972年7—8月间，孙平化同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成功地推动了刚刚上任的田中首相访华，从而实现了战后一直悬而未决的中日关系正常化。当时，我仍在东京做记者工作。7月10日，孙平化同志率中国上海舞剧团到东京时，人们知道平化同志不是搞文艺的，自然引起了种种猜测。我跟许多人都认为，就像以前他率“兰花”代表团、“围棋”代表团访日一样，这一次也是借田中先生出任首相的机会来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但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事态会发展得那样快，使平化同志和新上任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肖向前同志担任了直接推动田中首相访华，以实现中日复交的重大任务。在这里，起最关键作用的是周总理通过临时访日的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副团

长陈抗同志向孙、肖二人传达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我讲田中内阁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态度。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我们要紧跟。日方能来中国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过去有过‘王国权旋风’、‘玉晓云旋风’，这回不能再叫‘旋风’了，要落地。孙平化嘛，就是要高楼万丈平地起，肖向前就是继续前进的意思，这两个人就是要先把这件事落实才行。”

从此，在日本，争取田中首相访华，以实现中日复交的热烈气氛顿时高涨起来。作为记者，我们跟踪采访孙平化同志和肖向前同志一道多次会见大平外相的活动，而每一次会见后，平化同志都亲自口授消息内容，为我们向新华社发稿提供了方便。特别是8月15日，田中首相在东京帝国饭店会见孙、肖二人。战后日本首相正式会见中国代表，尚属首次，因而这是特大新闻。双方会谈后，孙平化同志把一张事前在“美浓纸”上用日文打好字的新闻稿给了我。这是日本外务省早已准备好，并经过双方商定的。孙平化同志对我说：“你们就按此口径发消息。这次我们谈得很好。田中首相问我北京什么时候气候最宜人。我告诉他，最好是9、10月间。我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田中首相尽管没有明确地说他在9、10月份访问中国，但这个可能性很大。”周总理对孙、肖二人的重大嘱托，就要实现了，孙、肖二人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和期望。我从他们二人的表情看出，如释重负，信心大增，对前途充满希望。孙平化同志爱开玩笑，当时他

对我说,这件事办不成,我就无脸回国见周总理和江东父老啊!

我认为,对于孙平化同志来说,这一次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应该说这是他对日工作生涯中最风采的一页。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在北京机场,同周总理紧紧握手。9月29日,中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联合公报,宣布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从而为中日两国关系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孙平化同志在北京迎来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我想,他一定是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中日复交后,按周总理的指示,要“饮水不忘掘井人”,中国人民要永远不忘老朋友。在这一方面,孙平化同志堪称我们当中的楷模。他一直作为中日友好协会的领导人,继续从事民间交流,更加努力地广交朋友,深交朋友。他结交朋友的面很广,日本的政界、经济界、文化艺术界、友好界、科技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体育界等等,都有他的好朋友。平化同志自己说,他每年向日本朋友(名字和人头能对得上的)发的贺年卡近400张。在中国从事对日工作的人当中,交友如此广,如此多,如此深的,我想平化同志是数一数二的吧。但是,孙平化同志从来不以此居功自傲。他总是谦虚地说,“这些财产,都是周总理和廖承志先生留下的,我的责任就是继承和保护好这些财产。”

1985年秋,孙平化同志与我合作,曾写过一篇长篇论文《珍惜艰难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发表在那一年10月

27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来，全国各地的许多报纸都转载。那篇论文，是针对那一年在中日之间出现的新情况写的。那一年的8月15日，当时的日本首相不顾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强烈反对，作为战后日本的首相，第一次正式参拜了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青年学生的抗议和爱国主义行动，为此需要对日本的执政者表明中国的严正立场，同时还要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中日关系的现状和出现的问题。那篇文章，是在胡乔木同志的关心和安排下写成的。我想，孙平化同志作为撰写人之一，应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当时，孙平化同志把他已经写完但尚未出版的《中日友好随想录》书稿拿来，做我执笔时的参考。如果没有孙平化同志慷慨地提供《随想录》的原稿，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如此顺利地写成那篇论文。初稿写好后，他多次认真修改，有几处还做了重点补充。例如，文内谈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协助留在中国各地的日侨回国那一段，平化同志补写了如下的话：这项工作“按日方通常说法直译过来叫做撤侨，周总理考虑这样说不妥，因为国家间发生冲突、甚至要宣战才‘撤侨’，所以应该称为协助日侨回国”。文章发表后，平化同志还注意搜集各方面的反应，他把日本翻译的几种版本寄给我，并要我对照原文看，是否有出入？由此可见，他非常注意掌握对日政策，对工作又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

我在同孙平化同志的接触中，深感他是一位既机智又懂幽默的人，同时也是一位富有人情味儿的人。他常说他的

日语不地道。如果说这反映了 50 年代初期的实际情况,那么到了 70 年代以后,他的日语水平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依我看,这不仅仅是他的日语水平本身有了惊人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有丰富的思想和经验,而且既机智又幽默的缘故。有一次,一位日本朋友称呼他“孙平化阁下”(“平化”的日语发音,同“陛下”。“孙平化阁下”的音同“孙陛下阁下”)。平化同志风趣地回答说,“不必称我‘阁下’,因为我已经‘是孙陛下’了。”像此类幽默,使人会顿时感到一种温馨,并能缩短彼此的距离。记得,1957 年 11 月我跟随王震同志率领的中国农业代表团访日时,作为代表团秘书长的平化同志很能体会从事对日工作的人亟想了解日本社会情况的那种迫切心理,专门带我一个人到东京的一家电影院观赏了根据三浦绫子的畅销小说改编的影片《冰点》。在当时中国出国人员不能随便进日本电影院看电影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孙平化同志由于年轻时在日本生活过,所以对日本“料理”很感兴趣。他也能体会到曾在日本长期生活过的人的心情。1955 年春天访日的那一次,我们每天早晨在饭店食堂吃“西洋料理”,难免有些吃腻。是平化同志首先提议增加“味噌汁(黄酱汤)”和“纳豆(拉丝豆豉)”的。我生平第一次吃“纳豆”,就是在那时。中日恢复邦交 20 周年的 1992 年秋,在北京我和妻子见到平化同志,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好久没有吃‘寿司’饭了,您这个中日友协会长是不是应该在‘白云’请我们吃一顿?”没想到平化同志很认真。他在给我

寄来一本刊有他一篇谈话的日文杂志时，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封信，上面写道：“德有同志：……年过古稀，言所欲言，不对之处，文责自负。因系约稿，无法不登。寄来数本，无地堆放，弃之可惜，看也无味。奉上一册，茶余饭后，如未疲倦，仅供消遣。如蒙指正，幸甚幸甚。寿司之事，记在心间，大义名分，品尝放心，请告小顾，相聚有期。闲来无事，废话一篇，到此停笔。”落款是“孙平化 十一月二十五日”。果然，不久以后，应日本朋友之邀，我和妻子随同平化同志一道在“白云”饭馆，饱餐了一顿“日本料理”。

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次我对孙平化同志说，您经历了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全过程，是战后中日关系的见证人，也是一部活字典。您为了后来人，应该围绕着您的经历，写一部中日关系史，或者中日关系外史。平化同志听罢，笑了。他说，“过去按纪律的规定，不但没有记日记，连一张纸片也没有留。怎么写呢？”过一段时间后，我听说他已动笔开始写回忆录。这便是1986年12月出版的《中日友好随想录》。后来，他又陆续写了许多篇怀念过世的日本朋友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1992年，孙平化同志第一次接受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森住和弘的采访，全面地谈了他的经历，并发表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平化同志在他的晚年，经水野清先生的推荐，再一次向《日本经济新闻》记者谈了自己的经历。这便是在中日复交25周年的1997年9月开始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的《我的履历书》。

现在，日本经济新闻社将孙平化同志的《我的履历书》